

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

□ 杨建华 张秀梅

内容提要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本文从“代际/代内”、“水平/垂直”两个角度分析了浙江省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总体情况。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整体流动性都较高,代际流动大于代内流动;但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都表现出底层以水平流动为主,上层以“精英再生产”为主;中层以上社会地位较封闭,流动多发生在邻近阶层。因而,人们对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流动机会不太乐观。

关键词 职业 社会地位 流动 精英再生产

作者杨建华,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张秀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25)

引言

社会流动是指人的特定的社会地位的变动,是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sorokin, 1927)。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各层次间的互动、动力机制、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量变过程(陆学艺, 2004)。

社会学常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来评估社会开放程度。代内流动是个人在一生中发生的社会地位变化,代际流动则是子代与父代社会地位的升降比较。如果一个社会中父代的阶层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子女继承,那么我们就称之为封闭性的社会;相反,如果子女阶层地位的获得更多的依靠后致性的因素,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代际流动中又可区分为复制式流动与替代式流动。如中国民间说法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一种代际间的复制式流动,也是一种世袭式的流动。而民间所说的“富不过三代”、“寒门出贵子”则是一种替代式流动。

根据流动的方向,社会流动又可分为社会位置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sorokin, 1927)。水平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的水平流动,它多半是地域间的流动,也包含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工作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流动。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从下层地位和职业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或者从上层地位和职业向下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

在前现代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几乎就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生在哪个阶级、阶层,一辈子就是那个阶级、阶层的成员,一般不会变易。阶级、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界限十分清楚,几乎不可逾越,社会流动几乎等于零,所以称之为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化生产的不断拓展,产业结构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变,客观上创造了新的社会岗位,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流动的需要,因此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通过后致性规则亦即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总体而言,在封闭

性社会里,先赋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里,后致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陆学艺,2004)

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当表现为能够为每个成员依据其能力提供垂直流动的条件,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以能力为人的衡量标准的社会,不以先赋因素而是自致因素来最终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合理、充分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前进中化解冲突,保持稳定与平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农民赤脚上田,务工、经商、办厂,很多农民成为企业家和商人。高考制度的恢复,也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实现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正是充分的社会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

但是,当前社会流动总体状况如何?代际流动状况如何?为什么人们感到社会中“拼爹”、“萝卜坑”现象增多?社会流动中有多少属于向上的垂直流动,有多少只是属于空间或岗位变化的水平流动?中等群体发展状况如何?这些都是人们极其关注的重大社会热点问题。正是带着这些人们极其关注的热点问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于2011年6月份开展了以“浙江省城乡居民社会流动”为主题的大型问卷调查。现从职业流动和社会地位流动两个角度,将本次调查中涉及到人们更加关心的“代际/代内、水平/垂直流动”中的若干分析判断报告如下。

一、调查说明及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概率与群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在全省11个城市按照地理区划和经济发展水平,抽取了浙东北和浙西南的6个城市,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人口比例,每个市抽取相应数量的区、县及乡镇,然后按照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家庭户——个人逐层抽样,回收有效问卷1213份。

样本情况:男性占53.9%,女性占46.1%;已婚占85.3%,未婚占14.7%;农业户口占42.6%,非农户口占57.5%;党员占24.3%,共青团员占11.6%,民主党派占0.3%,群众占

63.8%;年龄上,25岁以上占11.6%,25—35岁占29.6%,35—45岁占32.0%,45—55岁占24%,55岁以上占2.8%;文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占43.1%,高中/中专/职高占21.1%,大专占13.3%,本科及以上占22.4%;职业类别,包括了国家公务人员(9.2%)、经理人员(4.0%)、私营企业主(3.9%)、专业技术人员(17.6%)、办事人员(16.1%)、个体工商户(15.9%)、商业服务人员(6.7%)、工人(14.0%)、农业劳动者(10.5%)和失业无业人员(2.1%)十类人群。

二、职业流动情况分析

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在现代社会中,职业既是人们的一种工作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与个人声望、教育水平和收入有密切的关系,仇立平(2001)提出“职业地位”的概念,并指出“职业地位”是由职业权力、职业所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职业所具有的声望所构成的,是社会分层的指示器和主要指标。由于不同的职业与不同的收入、权力控制和工作的自主程度直接相关,并对从事该职业的个人有不同的知识技能或资本实力的要求,因此,社会上人们对各种职业地位的评价是不同的。

(一)社会总体流动性较高,代际流动大于代内流动

从职业流动来看,浙江省的总流动率为65.07%,应该说是一个流动性较高的社会,并且其中的向上流动率也很高,达57.55%。总流动率是全部代际职业流动的总和,包括了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而结构流动率则反映了职业结构变化的程度,也即新增的职业和岗位所提供的流动机会。浙江省的结构流动率为42.34%,也就是

表1 职业流动总体情况(%)

| 流动类型 | 总体流动情况 | 代际流动情况 | 代内流动情况 |
|-------|--------|--------|--------|
| 不流动率 | 34.03 | 24.5 | 51.7 |
| 总流动率 | 65.07 | 75.5 | 48.3 |
| 向上流动率 | 57.55 | 62.15 | 36.4 |
| 向下流动率 | 8.42 | 13.35 | 11.9 |
| 结构流动率 | 42.34 | | |

说社会流动中,有42.34%的机会是由于经济社

会的发展而提供的。

从总体来看,代际总流动率为 75.5%,代内总流动率为 48.3%,代际流动率比代内流动率高出 27.2 个百分点,并且代际流动中向上流动占了 62.15%,而代内流动中向上流动率仅为 36.4%。也就是从父代到子代的职业地位变动机会,比子代自身从初职到现职的职业地位变动机会要好,也即许多人与父代相比,属于向上流动,而与自身刚参加工作对比,其职业地位的变动并不大。一方面说明了随着时代的进步,整个社会在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同代人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流动机会是有限的。男性与女性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中无论是流动机会还是流动方向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异,说明了现代社会两性平等较为深入。

(二)底层职业流动以水平流动为主,上层职业流动遵循“精英再生产”逻辑

浙江社会流动率很高,但假如农业劳动者在职业上只是转变为城市的体力劳动者,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地域流动,这还只能算是一种水平流动。因此,我们以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来对人群进行划分,即农业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包含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工商户),非体力劳动者(含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国家公务员)。

表 2 代际职业流动(1)(%)

| 父代职业类别 | | 子代目前职业类别 | | | |
|--------|-------|----------|-------|--------|-----|
| | | 农民 | 体力劳动者 | 非体力劳动者 | 总计 |
| 农民 | 52 | 20.81 | 39.39 | 39.8 | 100 |
| 体力劳动者 | 22.7 | 1.9 | 45.24 | 52.86 | 100 |
| 非体力劳动者 | 20.90 | 0.48 | 18.66 | 80.86 | 100 |
| 总计 | 100 | 11.82 | 36 | 52.19 | 100 |

父代为农业劳动者高达 52%,而他们的子代为农业劳动者的降到了 11.82%。这里已经有了很高的流动。但我们也看到,他们大多还是属于一种水平流动,他们的儿子仍然从事农业劳动和从事体力劳动分别为 20.81%和 39.39%,两者合计为 60.20%。而父代为体力劳动者的,他们的子代仍为体力劳动者的还高达 45.24%,这一群

体的向上流动速度还不快。

我们再综合考量职业、收入、受教育、权力等要素,将受调查者大致区分为四类,即农业劳动者为一类(以 D 表示),商业服务人员、工人为一类(以 C 表示);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为一类(以 B 表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国家公务人员为一类(以 A 表示)。

表 3 代际职业流动(2)(%)

| 父代职业类别 | 子代目前职业类别 | | | | |
|--------|----------|-------|-------|-------|-----|
| | D | C | B | A | 总计 |
| D | 20.81 | 23.03 | 26.87 | 29.29 | 100 |
| C | 2.38 | 31.75 | 31.75 | 34.13 | 100 |
| B | 0.66 | 11.84 | 53.95 | 33.55 | 100 |
| A | 0.71 | 9.93 | 28.37 | 60.99 | 100 |
| 总计 | 11.82 | 20.35 | 32.28 | 35.56 | 100 |

表 4 代内职业流动(%)

| 子代初职职业类别 | 子代目前职业类别 | | | | |
|----------|----------|-------|-------|-------|-----|
| | D | C | B | A | 总计 |
| D | 24.62 | 27.69 | 32.31 | 15.38 | 100 |
| C | 5.53 | 47.23 | 35.74 | 11.49 | 100 |
| B | 0 | 6.09 | 75.65 | 18.26 | 100 |
| A | 0 | 4.38 | 13.13 | 82.5 | 100 |
| 总计 | 5.04 | 24.87 | 37.04 | 33.04 | 100 |

从表 3 和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的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存在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就代际流动而言,底层职业流动机会较均等,从 D 类职业转变成其他几类职业的比例相差不大,从 C 类职业上升到 B 类或 A 类职业的比例也相差不大。

第二、上层职业流动遵循“精英再生产”逻辑,即父代或初职处于 B 类或 A 类职业的,其现职基本上保留在 B 和 A 类职业中,较少降到 D 类或 C 类职业。

第三、就代内职业流动而言,更明显地体现出底层与上层职业类别上升的不同逻辑。底层职业类别更多的是水平流动,即初职为 D 类的,现职以 D、C 和 B 类职业为主,上升到 A 类职业的比例较小;初职为 C 类的也差不多。而初职为 B 类和 A 类的则具有较好的上升机会和保留在原职业类别的机会。

(三)代际流动中国家公务人员复制式流动率较高,优势职业的继承性较大

通过统计表来分析子代职业对父代职业的继承情况。首先,父代职业是国家公务人员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高达45.5%,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也高达14.3%,其余职业类别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都低于10%。

其次,我们重点考察职业序列的两极即父代职业为国家公务人员和农业劳动者其子代的职业情况。父代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其子代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为45.5%,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比例为12.70%,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14.50%,成为办事人员的比例为16.40%,也就是说国家公务人员的子女90%从事的是收入和职业声望都比较高的职业,而成为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不到10%。

再考察父代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其子女在各行业分布较为分散,成为农业劳动者和工人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0.40%和19.20%,其次是成为个体工商户比例为16.10%,成为商业服务人员的比例为3.40%;合计为59.10%。而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14.70%,成为办事人员的比例为10.30%,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仅为7.90%,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比例为6.20%;合计为39.1%。

比较不同职业间的代际复制率,可以看到办事人员、国家公务人员的复制率都比较高。一般说来,较高的职业继承性或复制率说明社会的流动性欠缺,社会系统的封闭程度较高,社会的传统色彩较浓;而较低的职业继承性和复制率则表明社会有较高的流动性,并且社会系统的开放程度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也较高。出身于不同职业家庭的人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几率有明显不同。例如,成为国家公务人员其家庭也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其所占比例是该家庭在总体结构中比例的4.8倍(26.9%/5.6%);成为国家公务人员其家庭为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其所占比例是该家庭在总体结构中比例的1.47倍(5.30%/3.60%);而进入公务人员队伍的其余家庭的比例都比其在总体结构所占比例要低,如成为国家公

务人员其家庭为工人的,比例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39.4%(4.30%/10.90%);成为国家公务人员其家庭为农民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83.2%(43.0%/51.7%)。各家庭出身进入国家公务人员几率的差别显示了这一职业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性。这说明优势职业地位的继承性更强,社会流动有固化趋势。

三、社会地位流动情况分析

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它通常是根据财富、声望、教育、权力的高低和多寡做出的社会排列,常用来表示社会威望和荣誉的高低程度,也泛指财产、权力和权威的拥有情况。客观社会地位是根据职业位置所占有的权威情况(是否担任领导或管理职务)、政治资本情况(是否具有行政级别)和技术资本情况(是否具有职称),综合得到职业地位,再将职业地位与经济收入、教育水平进行七级评分,得到社会地位得分。我们根据得分情况将客观社会地位分为社会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下层五个层级。

(一)社会地位整体流动性较高,但客观社会地位呈“倒丁字形”

比较父代与子代的社会地位分布能够反映浙江省社会流动的状况。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是向上流动的,代际之间最主要的流动是从下层流动到中下层和上层;代内之间最主要的流动是从下层和中下层向中下层和上层流动的。无论是代际还是代内都表现出整体向上流动。具体来看,父代的社会地位主要分布在下层(52.39%)和中下层(28.03%),这两个阶层累计为80.42%,父代社会地位为中层的为12.92%,为中上层及上层的共6.66%。社会地位这个指标是由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等综合而来,而父代中有52%的人为农民,66.6%的人只接受了小学及以下的教育,所以整体社会地位较低。子代现职社会地位比父代职业地位有显著提高,比初职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因而,整体是向上流动的,流动情况较好。

但浙江省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的分布还很不均匀,重心明显偏下,社会地位明显偏低。就现职社会地位而言,底座的三层构成比例较大,且没有拉

开差距,而上面的两层收缩很快,这种形态既不是典型的“金字塔”型,也不是标准的“橄榄”型,更不是“洋葱”型,而是类似于李强所说的“倒丁字形”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不健康、不稳定的。

为什么该扩大的社会阶层还没有真正大起

表 5 父代与子代社会地位分布(%)

| | 父代 | 子代初职社会地位 | 子代现职社会地位 |
|-----|--------|----------|----------|
| 下层 | 52.39 | 48.41 | 29.94 |
| 中下层 | 28.03 | 30.57 | 28.50 |
| 中层 | 12.92 | 17.52 | 25.05 |
| 中上层 | 5.67 | 3.03 | 10.94 |
| 上层 | 0.99 | 0.48 | 5.57 |
| 总计 | 100.00 | 100.00 | 100.00 |

表 6 代际社会地位流动情况(%)

| 父亲社会地位 | | 子代现职社会地位 | | | | | 合计 |
|--------|-----|----------|-------|-------|-------|------|-----|
| | | 下层 | 中下层 | 中层 | 中上层 | 上层 | |
| | 下层 | 44.49 | 26.27 | 18.22 | 6.99 | 4.03 | 100 |
| | 中下层 | 19.39 | 33.08 | 31.56 | 11.03 | 4.94 | 100 |
| | 中层 | 9.48 | 28.45 | 41.38 | 15.52 | 5.17 | 100 |
| | 中上层 | 1.82 | 16.36 | 30.91 | 30.91 | 20 | 100 |
| | 上层 | 0 | 12.5 | 12.5 | 37.5 | 37.5 | 100 |
| 合计 | | 29.87 | 27.79 | 25.71 | 10.94 | 5.69 | 100 |

表 7 代内社会地位流动(%)

| 初职社会地位 | | 目前社会地位 | | | | | 合计 |
|--------|-----|--------|-------|-------|-------|-------|-----|
| | | 下层 | 中下层 | 中层 | 中上层 | 上层 | |
| | 下层 | 50 | 34.85 | 13.64 | 1.52 | 0 | 100 |
| | 中下层 | 16.67 | 40.23 | 24.14 | 13.22 | 5.75 | 100 |
| | 中层 | 1.03 | 22.68 | 46.39 | 17.53 | 12.37 | 100 |
| | 中上层 | 0 | 10.53 | 26.32 | 31.58 | 31.58 | 100 |
| | 上层 | 0 | 0 | 0 | 33.33 | 66.67 | 100 |
| 合计 | | 29.08 | 33.39 | 22.98 | 9.16 | 5.39 | 100 |

根据表 6 和表 7 我们看到,第一、上层社会地位较封闭,对于中层及以下的社会阶层,只有很小的比例进入上层,也即中层以上社会地位的开放性欠缺。第二、社会地位流动多发生在邻近的阶层之间,大跨度的社会流动较少发生。

就代际流动而言,父代社会地位是下层的,

来,该缩小的社会阶层还没有真正小下去,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当前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也就是说,公正合理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尚未形成。

(二)中层以上社会地位较封闭,社会流动多发生在邻近阶层

与前面职业流动相似,社会地位的流动也存在着“精英再生产”的问题。中层以上社会地位较封闭,社会流动只发生在邻近的阶层中,大跨度的社会地位流动较少发生。

55.51%的子代发生了向上流动,其中主要流到中下层和上层,占 44.49%,而上升到中上层和上层的仅 11.02%;父代社会地位是中下层的,51.47%的子代发生了向上流动,其中上升到中层的占 31.56%;父代社会地位是中层的,其子代向中上层(15.52%)和中下层(28.45%)两个方向流

动,且向中下层流动更为显著;父代社会地位是中上层和上层的,其子代向上层流动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群体,分别为20%和37.5%。

就代内流动而言,初职社会地位为下层的,有一半的人发生了向上流动,主要流向中下层(34.85%)和上层(13.64%);初职社会地位为中下层的,43.11%的人发生了向上流动,其中上升到中层的占24.14%;初职社会地位为中层的,也表现为向中下层和中上层两个方向流动。这说明了不管是代内还是代际,社会中层是属于比较开放的,既可能发生代际间向上流动,也可能发生代际内的向上流动,从而为更多的中下层及下层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初职职业地位为中上层和上层的基本还保留在这两个阶层。

(三)教育水平越高,社会地位越高

表8 本人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

| 本人受教育水平 | | 目前社会地位 | | | | | |
|---------|-----------------|--------|-------|-------|-------|-------|-----|
| | | 下层 | 中下层 | 中层 | 中上层 | 上层 | 合计 |
| | 小学及以下 | 85.31 | 12.99 | 1.69 | 0 | 0 | 100 |
| | 初中 | 48.83 | 36.72 | 14.45 | 0 | 0 | 100 |
| | 高中、中专、 中技、职高 | 15.32 | 47.75 | 33.78 | 3.15 | 0 | 100 |
| | 大专 | 0.68 | 36.49 | 43.92 | 17.57 | 1.35 | 100 |
| | 本科及以上 | 0.42 | 8.37 | 33.89 | 33.89 | 23.43 | 100 |
| 总计 | | 29.94 | 28.5 | 25.05 | 10.94 | 5.57 | 100 |

表9 父代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

| 父代受教育水平 | | 目前社会地位 | | | | | |
|---------|-----------------|--------|-------|-------|-------|-------|-----|
| | | 下层 | 中下层 | 中层 | 中上层 | 上层 | 合计 |
| | 小学及以下 | 38.24 | 28.72 | 20.92 | 7.5 | 4.62 | 100 |
| | 初中 | 14.63 | 32.2 | 32.68 | 16.59 | 3.9 | 100 |
| | 高中、中专、 中技、职高 | 10 | 23.75 | 38.75 | 20 | 7.5 | 100 |
| | 大专 | 5.71 | 20 | 40 | 17.14 | 17.14 | 100 |
| | 本科及以上 | 0 | 15.79 | 21.05 | 31.58 | 31.58 | 100 |
| 总计 | | 29.55 | 28.49 | 25.29 | 11.05 | 5.62 | 100 |

就父代教育水平而言,其对子代目前社会地位的影响虽然不像子代自身的教育水平那么显著,但也呈现大致相同的逻辑。父代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子代社会地位也主要分布在中层

我们通过分析教育与社会地位的关系,发现教育影响社会地位的分布,无论是自己的教育水平,还是父亲的教育水平,都与社会地位呈正相关,即教育水平越高,社会地位也越高,且在子代内部的表现更显著。

就子代的教育水平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主要分布在下层和中下层,其上升到中上层和上层的可能性极低;而受过高中及相当教育的人,则有较大的机会进入社会中层(33.78%);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成为社会下层的可能性极低,都不超过一个百分点,其中大专水平的人主要分布在中下层(36.49%)和上层(43.92%),本科及以上的人主要分布在中层及以上,占91.21%。

及以上,但有一定的比例进入中上层和上层;父代教育水平为高中及相当水平的,子代社会地位较分散;父代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上的,子代也主要分布在社会中层及以上。

(四)主观社会地位呈“橄榄形”,与客观社会地位有差异

主观社会地位是指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在本项研究中,也测量了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如表 10 所示。

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
表 10 主观社会地位分布

| | 频数 | 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 下层 | 235 | 21.42 | 21.42 |
| 中下层 | 300 | 27.35 | 48.77 |
| 中层 | 422 | 38.47 | 87.24 |
| 中上层 | 128 | 11.67 | 98.91 |
| 上层 | 12 | 1.09 | 100.00 |
| 总计 | 1,097 | 100.00 | |

“中庸”效应比较明显,呈“橄榄形”。社会成员在上层地位上较“谦虚”,主观认为是上层的仅为 1.09%,而客观则为 5.57%;主观认为是下层的占 21.42%,而客观认为是下层的则占“29.94%”,也即出于地位的“自我保护”,更多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属于上层或下层,而愿意把自己归入社会的中层。

表 11 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的差异比较

| | 频数 | 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 主观评价明显高于客观评价 | 86 | 9.03 | 9.03 |
| 主观评价略高于客观评价 | 223 | 23.42 | 32.45 |
| 主观评价等于客观评价 | 388 | 40.76 | 73.21 |
| 主观评价略低于客观评价 | 181 | 19.01 | 92.22 |
| 主观评价明显低于客观评价 | 74 | 7.78 | 100 |
| 总计 | 952 | 100 | |

表 11 是社会成员对主观社会地位与客观社会地位之间差异的比较,其中,“明显低于”或“明显高于”表明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两个地位等级及

以上,“略低于”或“略高于”表明两者之间相差一个地位等级。从表中可以看出,主观社会地位以一定的客观社会地位为基础的,但有偏差。其中,主观等于客观的占 40.76,而主观与客观相近(略高于或略低于)的占 43.43%,也就是说主观评价与客观测量相差较大的占 17.81%,其中 9.03%的人是主观评价高于客观,7.78%的人是主观评价低于客观。

(五)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很高的仅占 3.06%,认为流动机会不大的群体占到 45%

我们已经看到浙江的职业流动率虽然较大,但职业序列较高的类别其代际复制率较高,如国家公务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的子女从事相应职业的比例很高。而客观社会地位的流动也多发生在邻近阶层当中,大跨度的社会地位流动较少发生。那人们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又是如何呢?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您认为个人提升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有多高”的问题,被调查者的看法比较消极。认为没有机会和机会低以及不知道或很难讲的占 45.03%,而认为较高的为 17.96%,认为很高的仅占 3.06%。

表 12 对个人提升社会阶层机会的评价

| | 频数 | 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 没有机会 | 169 | 13.99 | 13.99 |
| 低 | 206 | 17.05 | 31.04 |
| 一般 | 410 | 33.94 | 64.98 |
| 较高 | 217 | 17.96 | 82.95 |
| 很高 | 37 | 3.06 | 86.01 |
| 不知道/很难讲 | 169 | 13.99 | 100.00 |
| 合计 | 1208 | 100.00 | |

这种感受应该是当下社会现状的一种折射。一方面人们对更高社会地位的期盼,另一方面又缺少这样向上流动的环境和机会。在前面调查数据中已经看到农民和工人群体向上流动趋缓,从农民、工人中分化出来的中等阶层增长缓慢,在单位、部门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其向上流动空间被挤压,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受阻。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层结构上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果实的

社会排斥现象。排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就是对社会流动机会的获得预期不好,前景不明。就社会结构而论,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原则,“先赋性”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2. 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载《分层社会学研究》2001 第 3 期。
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4.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02 期。
5.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

6. 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7. 吴忠民、林聚任:《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来自山东省五城市的调查》,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 第 02 期。

8. 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9. 严善平:《大城市社会流动的实态与机制——来自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03 期。

10. 张翼:《中国人的社会地位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载《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4 期。

11. 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载《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6 期。

24. P. M. Blau and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7.

25. Sorokin, P. A., 1927;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责任编辑 徐东涛